



孟城驛

屈原的追询

□ 周游

又临端午。两千多年前的风雨雨一刹那间近在咫尺——屈原在汨罗江畔踽踽而行吟着《天问》，从容不迫而气势如虹，那最后的背影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那部悲怆的史册上……

屈原出身于贵族家庭，颇有文学天赋。少年时代，他曾创作一首《橘颂》言志，“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屈原从小熟谙本国的历史，有着很深的乡土之情和民族观念，决心像橘一样不离本土。

果然，这株橘树很快长大成材了！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检阅历史，我们发现楚怀王当政前期并不像后期那般糊涂，而是一位雄心勃勃、颇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他破格提拔屈原担任左徒，为屈原实现从少年时代就怀抱的理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屈原的理想是什么？两字便可概括：美政。美政理想的核心就是民本思想。可以说，美政是屈原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治目标，也贯穿在他的诗歌中，成为统率他创作的灵魂。他在诗歌中始终要求楚王体察民生的艰难，了解民心的向背，关心百姓的疾苦。

毋庸置疑，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光芒四射的时期。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显得那样聪颖明睿、潇洒自如。最重要的是，屈原精通历史、“明于治乱”，富于革新锐气，在此期间促成怀王实施了一系列“朝政改革”。而楚怀王，也因急于有所作为，欲与西方的强秦、东方的齐国争雄，对屈原的主张十分支持。楚国的朝政由此蒸蒸日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

还有一项重大决策，显然也是洞察战国局势变化的屈原促成的，那就是毅然改变楚国的亲秦外交，而与东方的齐国结成共同抗秦的联盟。

“乘骐骥以驰聘兮，来吾道夫先路！”一度睡卧的楚国雄狮，终于在内外外交的大变革中奋起了。作为楚怀王的重要辅臣，屈原雄心勃勃，准备推行变法，振兴楚国。

二

屈原并非政治空想家，他有一定的从政治国的经验，其民本思想是希望国富民强、安居乐业，免受敲诈勒索、颠沛流离之苦。

然而，楚国的政坛却存在着两种不同战略思想和眼光。以王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政治保守势力深深地左右着楚怀王的决策。以屈原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实施政治体制改良。当那些既得利益阶层受到威胁时，两种势力便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屈原明知改革举步维艰，依然旗帜鲜明地表示：“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贤明的政治，需要贤明的人才来实行。可是，楚国

执政者多为奸佞，他们只知道追逐一己之私，全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排斥迫害贤明人士。因此，屈原极力主张“举贤而授能”，只有让德才兼备的人士来治理国家，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读《惜往日》，我们可知，楚怀王曾委托屈原立法、执法。屈原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进一步变法，集中国家的重权，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则止。楚怀王便将修订法令法规的大事全权委托屈原。本来，屈原身居高位就已引起靳尚等人的嫉恨，加上楚怀王又把起草宪令这个重大使命交给他，这更让靳尚之流眼红了。于是，早就“争宠而心害其能”的靳尚在这紧要关头就不得不撕下最后的面纱赤膊上阵了，他在楚怀王面前谗毁屈原说：“大王叫屈原制订法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每一项法令发出，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做的。’”楚怀王很生气，于是疏远了屈原。

以上记述见于《史记·屈原列传》。但从情理上说，对屈原一向倚重的楚怀王这时竟然为一件事、一句话便改变态度，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屈原被楚怀王疏远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封建社会所谓的变法，说白了，就是变换权力，把偏于守旧的旧有贵族手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夺取过来，一部分集中到君王手中，一部分重新分配给锐意变革的新兴的利益集团。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王无不通过变法加强自己的权力。如果一场变法不仅不能加强君王的权力，反而把他从权力的巅峰上拖下来，那他会怎么办？毫无疑问，他将立即终止变法，对法令的制定者或疏、或逐、或囚、或杀。

屈原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仔细检阅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楚王族三姓（屈、昭、景）中，屈氏势力最大，地位最为显赫。楚国重大的内政外交活动，几乎都有屈氏人物出场。而地位极高的左徒一职，常为屈氏垄断。一旦屈氏有所不忠，楚怀王极有可能被赶下台去。靳尚、子兰之流深知楚怀王心理。说屈原泄密，也就是暗示泄给了屈氏；而诬蔑屈原自矜其功，则直接点出屈原已经危及王权的威势。楚怀王为保自己的王位，立即终止变法，疏远屈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如果只有楚怀王疑忌这一方面的原因，屈原也许还可以对付，还能等待时机，尽释嫌疑，东山再起。可是，还有来自另一方面的攻击，屈原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

屈原是在屈氏一族的扶植下登上左徒之位的，族人将他推上全族最高的官位，自然希望他为本族谋取利益，最低限度也不要损害本族的利益。可惜，变法的矛头所向将

要使包括屈氏一族在内的贵族集团利益受损，这就让他们大失所望了，屈氏家族自然不会支持变法。

屈原无可奈何，“哀众芳之芜秽”。可以说，在这事关楚国兴衰乃至存亡的改革中，屈原是个孤军奋战的独行侠。

三

屈原被疏不久，支持他联齐抗秦且颇有作为的令尹昭阳也随之下台，由亲秦派的景鲤接任。一场由屈原发动的朝政改革，从此中断了。于是，楚国的政局便急剧地发生了逆转，而一直紧紧窥视楚国国内政变化的强秦开始把手伸过来了。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惠王遣张仪诈骗楚怀王，只要断绝与齐之盟交，即愿归还楚之“商於（今河南淅川）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大喜，即遣勇士北上辱骂齐王于廷，逼使齐国断绝了与楚国的联盟。而当楚使至秦索取偿地时，张仪却改口说：“当初只说归还楚地六里，哪来的六百里？”楚怀王气得七窍生烟，贸然发兵进攻秦国。秦国立即给予迎头痛击。楚军大败，损兵折将八万多人，汉中被占。眼看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楚怀王更加恼羞成怒，调集全国兵力孤注一掷，结果又是溃败。更有甚者，得悉楚军倾巢出动对付秦国，国内空虚，韩魏两国竟然趁火打劫；齐国因楚国单方面绝交而怀恨在心，不肯派兵援救。楚军东西受敌，兵力捉襟见肘，只好鸣锣收兵。

连遭惨败，楚怀王这才有所悔悟，忙请屈原出山再使齐国，重修旧好。由于楚怀王不久前的背信弃义，齐国早怀怨怒。因而，屈原此次使齐处境极为困难。但是屈原凭借自己的外交才华和一腔热忱打动了齐王，恢复了邦交。

听说屈原使齐，秦国便知大事不妙，立即派人使楚言和。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不仅使楚国遭受了韩、魏诸国的连年讨伐，而且导致秦军更加肆无忌惮地乘隙进犯。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国联合齐、韩、魏三国大举攻楚重丘（今河南泌阳东北），大将唐昧殉国；楚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秦复攻楚，斩杀士兵二万，并杀大将景缺。楚怀王不得不与众臣紧急磋商，命令大夫昭阳奉送太子人质于齐以求援助……

在这一段风雨飘摇的危难时期，屈原却始终没有在史籍记载中露面。许多研究者推测：他很可能由于坚主联齐抗秦，而被旧贵族党人排斥在外，继续担任着“三闾大夫”的闲散之职，根本无权参与朝廷议政。眼睁睁地看着楚国如帆落桅折的航船，随时都有触礁而沉的危险，自己却不能为它排难解危，屈原怎能不感到焦心如焚？

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这危险终于降临到楚国，而屈原也为此遭到楚怀王放逐。

事情是由秦昭王的一纸来书激起的。在连续三年军事进攻楚国以后，秦昭王忽然一变常态，致书楚怀王建议“和解”，并约请楚怀王到秦之边境武关（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好会”。这显然是一次居心叵测的凶险之会，然而楚怀王身边的大臣，如子兰及权臣靳尚，慑于秦之淫威，纷纷劝说楚怀王赴会。这消息传到屈原耳中，顿时将他惊呆了。他清醒地估计到，“武关之会”其实是个可怕的陷阱，楚怀王若从大臣之议赴会，定遭不测！一旦楚怀王遭秦挟持，楚国的命运便不堪设想。深切的忧虑，促使屈原作出了非常的举动，他竟不顾楚怀王不准他参与朝议的禁令，毅然赴阙强谏，从而与亲秦的子兰和靳尚等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可叹的是，在这一场关乎楚怀王安危、楚国命运的谏争中，屈原还是失败了。而且，由于屈原不顾个人安危，强谏“武关之会”而触怒楚怀王，导致屈原被“放流”了。这“放流”的地点，据《九章·抽思》所述，大抵就在远离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的汉水之北。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率领扈从刚入武关，就被秦国伏兵包围擒拿，押往秦都咸阳，被软禁了起来。

消息传到郢都，楚宫上下一片混乱。为了避免秦要挟，大夫尹昭唯急赴齐都，坚请齐王放回人质之太子熊横，立为楚襄王。秦昭王大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

楚襄王二年（公元前279年），楚怀王乘隙从咸阳逃出，后被秦师追及，死于西河。秦人谎称楚怀王“发病而死，第二年才归还灵柩”。

按说，楚怀王之死应该震醒楚襄王；屈原谏“武关之会”而遭放逐的冤屈，也应该得到昭雪了。

然而，楚王朝的旧贵族势力，特别是阴险狡诈的子兰和靳尚绝对不会放过屈原。于是，在子兰的授意下，靳尚在楚襄王面前陷害屈原：“屈原当年咒骂先王，本就罪不容诛；而今听说气焰更加嚣张，在汉北鼓动百姓，攻击大王您‘信用奸佞，置父仇国耻于不顾，有违万民仰戴之望’。观其用心，岂不是要翻当年之旧案、取大王之位而代之？”

昏庸的楚襄王最怕的就是动摇自身的王位，听了靳尚的谗言，勃然大怒，当即下令：不准屈原再涉江夏一步！

四

官场政治的波涛很快便将屈原彻底掀翻了。邪恶势力犹如洪水猛兽冲垮了屈原正直与善良的堤岸，

也冲毁了他那颗悲怆的政治雄心。

屈原被迫离开楚国的政治中心郢都，他的全部政治理想遭到了最无情的扼杀和迫害，并被永远拒之门外。在长期流浪生涯中，他仍十分关注楚国的命运，写下了《离骚》《天问》和《九歌》等光照千秋的诗篇，尤其是《离骚》，反映了诗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每读一行诗句，我们仿佛登上一级台阶。我们与诗人同呼吸、共命运，体会着两千年前那场悲剧的悲壮浓烈的氛围。

可以说，屈原的悲剧与其历史局限性是紧紧相连的。他死心塌地地忠于与之有着宗法联系的楚王朝，永远无法解脱，即使死去，也是如此。他在《离骚》中表现着自己“九死犹未悔”的执著的信念；他在《悲秋风》中袒露自己感天动地的忧伤……他对自己遭受放逐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屈原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为什么”和“什么”，其深度、广度，正如鲁迅所言：“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他对宇宙万物的造成、运行和因果进行了广泛的拷问，但这除了有助于抒发内心的苦闷之外，对自己的疑问是没有帮助的。

君王和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最优秀的分子和最高形式，我忠君爱国，为什么还被放逐呢？屈原遍征询问仍找不到心灵的支点，他从少年时代树立起来的信念轰然倒塌，竟把自己的生命推向了虚无的深渊，当所有的道路都通向绝望与悲哀之后，当他与神灵的对话全被封死之后，当他听到秦军攻破郢都之后，世上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失去了价值。于是，他以死的方式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这个肮脏的世界，纵身跃入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中。

汨罗江翻腾着，汨罗江呜咽着……江水带走了那具老弱的身躯，却把诗魂留在楚国大地上。

屈原就这样走了！从此，那正义的追寻和纯净的歌声便在汨罗江畔悄然歇息了。

这一年，有人说是公元前278年，有人说是公元前277年，有人说是……

这一天，有人说是农历五月初五，有人说是农历五月十五，有人说是……

然而，这很重要吗？

从此，中国每一条江在农历五月初五沸腾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龙舟竞渡，粽子纷飞……所有的中国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喊声，呼唤着一个伟人。

多少粽子撒下去了，蛟龙在每年这个时候饱餐之后就不吃诗祖的尸体了吗？

多少龙舟划过去了，是谁抢先将诗祖的魂灵从江中打捞上来了呢？

汨罗江仿佛变成一枚鼓槌般的惊叹号，而屈原那渐去渐远的背影似乎一下子定格成一个黑色的问号。

这个问号永远打在中华民族的心头！

我的老家庄子向东约1000米，便是方圆几十里的白马荡。放眼望去，河汉纵横、碧水泱泱，沙滩成片、芦苇苍苍，好一派旖旎的水乡风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每当端午节临近，打棕箬便是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小伙伴创收的好时机。中午、晚上放学后，成群结队地去白马荡打棕箬。芦苇丛里密不透风，烈日当头，上烤下蒸，酷热难忍，且蚊虫成群、蛇蝎出没。但是，为了抓住那十来天时间，多打些棕箬卖钱，我们却是兴致浓厚，劲头十足，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在芦苇丛中，我们高高地仰着头，专拣高大、健壮的芦秆下手，扳低芦苇最

粽箬情

□ 赵旭东

顶端，采摘最上面鲜嫩的两三片新叶，一把一把，一捆一捆，积少成多。从芦苇荡里打回来的棕箬，放在河边的大桶里，用清水养着保鲜。在赶集的前一天晚上，将芦叶一片片顺向叠齐，鲜嫩宽大的叶片放在外层，分成二至三斤一小把。第二天，我带上小秤，挑着一担棕箬，来到离家五六里地的吴堡集市售卖。早晨，集市人流如潮，每斤棕箬可以卖到一角钱；到中小时分（十点钟左右），赶集人流逐渐稀

少，每斤只能卖五六分钱；临近散集，看着箩筐里还没卖完的棕箬，很是着急，四毛钱一斤也卖；实在卖不完了，就饿着肚子，走村串户，沿路兜售。就这样，一个“端午季”，总能卖上二三百斤棕箬，能赚二十多块钱。二十多块钱，今天算来也就四五碗鸡蛋阳春面的价值，可在五十多年前，那是我们高中学生一个学期的伙食费。父母与我约有在先，卖棕箬的收益全归我支配。当然，我也不会乱花钱的，钱还是用在购买学习用品、午餐代伙费等必须的开销上。我上高中时的黄色帆布书包、白色跑鞋，还有我穿的第一双尼龙袜子，就是用卖棕箬的钱买的。

又是一年端午节。我轻轻地向芦苇秆顶端嫩叶下手，中指食指按住叶茎上托，大拇指反向用力，“啪嗒”，便打下一叶。粽叶很乖巧地依次跳落到手心，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叠放整齐，生怕弄破。

嫩绿的粽叶打回来，开水一烫碧如翡翠，幽幽清香气氤氲厨房。放满水的池子，养着那一片片翠绿的粽叶，犹如大自然馈赠的精美礼品。

粽叶用它那柔韧的身躯，包裹住糯米红豆和蜜枣或咸肉。一白一红的糯米与枣豆肉馅料融合，宛如初升的朝阳与夜幕交替的时刻，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

经过水与火的洗礼，粽子褪

包粽子

□ 陈秀珍

去了青涩的外衣，展露出真颜。那层层绿叶，仿佛是自然的画布，上面描绘着生命的色彩。轻轻剥开那层绿色的帷幕，眼前出现的是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玛瑙绿宝石。它们在米团中若隐若现，为我们的味蕾献上了最美的诗篇。

粽叶包裹着一份份温暖与甜蜜，成为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音符，让人在品味之余，也深深陶醉在那浓郁的节日氛围之中。